

（中国音乐部分）

大学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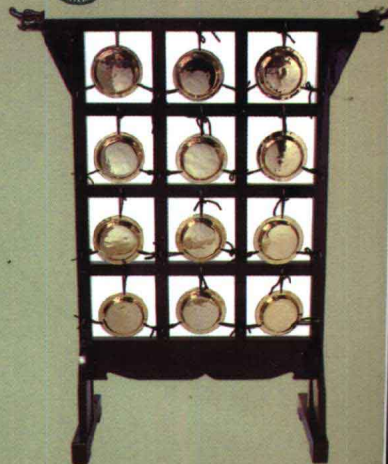
袁静芳 主编

袁静芳 蒲方 张伯瑜 褚厉 著

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



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大学音乐

(中国音乐部分)

袁静芳 主编

袁静芳 蒲方 张伯瑜 褚历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音乐:中国音乐部分/袁静芳主编;袁静芳,蒲方,张伯瑜,褚历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9

(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系列丛书)

ISBN 7-307-03288-0

I. 大… I. ①袁… ②袁… ③蒲… ④张… ⑤褚…
Ⅱ. 音乐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681 号

责任编辑:陶洪蕴 责任校对:王建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湖北省荆州市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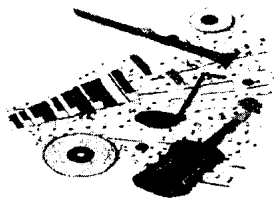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58千字

版次: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3288-0/J·32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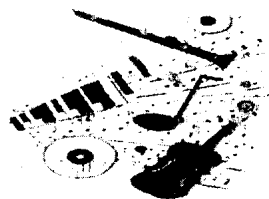


第一讲	绪论	(1)
第二讲	曾侯乙墓的钟鼓乐队	(19)
第三讲	琴曲《梅花三弄》、《流水》、《广陵散》	(38)
第四讲	古代词乐——姜白石歌曲	(56)
第五讲	琵琶武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	(73)
第六讲	琵琶文曲——《夕阳箫鼓》、《月儿高》	(92)
第七讲	筝曲《渔舟唱晚》、《高山流水》、《寒鸦戏水》	(116)
第八讲	大型乐舞——木卡姆	(130)
第九讲	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和他的二胡曲 《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听松》	(138)
第十讲	民族音乐革新家刘天华和他的二胡曲 《病中吟》、《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	(158)
第十一讲	黄土高原的“信天游”与西北的“花儿”	(181)
第十二讲	多声部民间歌曲	(196)
第十三讲	近代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 《玫瑰三愿》、《嘉陵江上》等	(214)
第十四讲	抗日救亡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 《大刀进行曲》、《长城谣》	(232)
第十五讲	近代合唱音乐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249)

第十六讲	近代歌剧与歌剧音乐《白毛女》、 《洪湖赤卫队》选段·····	(266)
第十七讲	近代钢琴音乐与钢琴曲《牧童短笛》、 《梅花三弄》以及《黄河》协奏曲等·····	(285)
第十八讲	近代小提琴音乐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 与祝英台》·····	(305)
第十九讲	民族管弦乐曲《喜洋洋》、《花好月圆》·····	(315)

第一讲

绪论



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悠久历史

(一)远古、先秦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已有五千余年,而音乐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远。1986~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二十余枝骨笛,其形制精细、规范、统一,管身两端相通,长约20厘米,管身上开有7孔(另有1小附孔)。经过对其中最完整的1枝骨笛(M282:20)进行试奏与测音,可以准确地奏出七声音阶;其中有5枝,可奏出完整的五声音阶曲调。据碳十四测定,其历史距今约八千至九千年,与裴里岗文化同期,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物,这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能够证实我国音乐文化产生时期的最早的文物实证。新石器时代为我们遗留下来的珍贵出土文物,还有浙江省杭州湾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百六十余枝大小形制不同的骨笛。根据各骨笛的制作特点,即音孔、吹孔位置布局分析,从吹管乐器的发音原理上看,已经形成了开管乐器、闭管乐器、拉管乐器三类不同形制

乐器的雏形,说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我国先民对吹管乐器各种发音原理已认识与掌握。

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了“樂”字,其形状如木架上置放着一件丝弦乐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周代,孔子编辑的诗歌总集《诗经》,使 305 首精选的古代诗歌传承至今,当时这些诗歌都是配乐演唱的。从诗歌结构分析其音乐曲式结构,已有十余种不同的曲式结构布局模式,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阶段。《诗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民间歌曲收集整理工作的光辉起点,其歌词所表现的社会文化生活,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之开端,对后世音乐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先秦时期的乐器已有鼓、鼗、賁鼓、应、田、县鼓、钟、镛、南、钲、磬、缶、编钟、编磬、铃、陶铃、雅、柷、敔、和、鸾、簧、哨(陶制、骨制等)、埙、龠、篪、言、箫、管、篴、笙、琴、瑟、筑等多种。在原始社会里乐器的出现多与神话传说、求神祭祀、民间舞蹈、劳动生活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乐器除用于宗教、礼仪等场合外,主要是供统治者娱乐享受。在乐器制作上精美豪华,规模越来越大,如《吕氏春秋·侈乐》中所载:“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钹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先秦时期我国乐器发展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根据乐器制作的材料,把众多乐器归纳为八类,称为“八音”。其八类名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乐器分类的方法。金属类乐器如钟、镛、钲;石属类乐器如离磬、鸣球;土属类乐器如埙;革属类乐器如鼓、鼗、賁鼓;丝属类乐器如琴、瑟;木属类乐器如柷、敔;匏属类乐器如簧、笙;竹属类乐器如箫、龠、言、篴。这一历史阶段,见于记载的乐器已有一百多种。

其二,在吹管乐器的形制方面,远在上古时期已有开口管乐器与闭口管乐器两种类型。开口管乐器如簫、骨哨,闭口管乐器如篪、埙等。由于它们在发音原理上的不同,丰富了我国管乐器的演奏方法,并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表现能力。

其三,簧管乐器竽、笙在当时制作的水平已很高,而且品种多样,已有大、中、小等多种形制。特别是竽,在当时宫廷乐队中地位十分重要,据《韩非子》载,竽“为五声之长”,“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竽在乐队中处于领奏、主奏的地位。

其四,先秦时期的钟属乐器,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音乐文化特点之一,表明了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和音律科学达到的高度。早在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套。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发掘的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编钟64件,另镈钟1件,是目前我国出土文物中最大型、最完整、最具有科学水准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一套编钟。整套编钟十二律俱全,可以在三个八度范围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音阶;钟上还铸有关于音律的铭文两千八百余字。这一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四百多年的音乐宝库,成为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光辉创造的见证。

其五,先秦时期已有弹弦乐器琴、瑟,它们除用于声乐伴奏外,据《列子》、《吕氏春秋》等文献所载有关伯牙、子期知音的传说,还可以推断出当时已有琴独奏艺术的存在,它以大自然为描写对象,音乐作品已具有一定的艺术概括能力。

在上层社会和宫廷音乐中,乐队组合形式有多种,其规模均很庞大。如《韩非子·内储说》所载,齐宣王喜听竽声,曾组织有三百人的大型竽合奏乐队,供其娱乐欣赏。从曾侯乙墓发掘的乐器来看,有青铜编钟、石编磬和鼓、瑟、琴、笙、排箫、篪八种,共124件。绝大多数乐器陈放在中室,编钟、编磬分别沿中室南、西、北三壁立架悬挂,鼓、瑟、笙、箫、篪列于其间,展现出古代上层社会大型乐队的一种组合形式。

(二) 汉魏、南北朝时期

汉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叫相和,它是对民间歌曲作艺术加工后所形成的歌、舞、大曲等音乐的总称,根据其艺术形式可分为相和歌与相和大曲两种。相和歌为“汉世街陌讴谣之词”,即民间歌曲,最初的表演形式是徒歌,不用任何伴唱、伴奏,亦称“但歌”;后又有以乐器相和的表演形式,唱者执节,伴奏乐器有笛、笙、琴、琵琶、箏等。相和大曲为歌、舞、乐相结合的多段大型歌舞艺术表演形式,已具有相对固定的大型套曲曲式结构模式,它是在相和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唐以后,相和大曲以其新的面目融会到清乐大曲之中。

当时出现的乐器主要有箏、琵琶(有秦汉子和阮咸两种不同的形制)、笛、方响、篪篥瑟(即卧篪篥)。箏、琵琶、笛均为相和歌的伴奏乐器。这一历史时期,吸收外来乐器数量不少,如随着鼓吹乐的引入,还使用了笳、角、中鸣、长鸣、羌笛等吹管乐器。由于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传入的乐器主要有竖篪篥、波斯琵琶(即曲项琵琶)、箏篥等。竖篪篥亦为波斯乐器,魏晋之际传入我国。曲项琵琶约在公元350年前后通过印度和新疆,传入甘肃一带,据《梁书·简文帝本纪》所载,至少在公元551年(南北朝时期)已传入南方。

除相和外,这一时期鼓吹乐已开始在宫廷中演奏并获得了发展。西汉初期,鼓吹乐已传入。最早关于鼓吹乐演奏形式的记载为“班壹秦末避地楼烦,以牧起家,出入戈猎,旌旗鼓吹,以财雄边”。《旧唐书·音乐志》载曰:“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当时演奏北狄乐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汉代宫廷鼓吹乐的应用分四种形式:①黄门鼓吹,用以宴乐群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所定殿中御食饭举乐有《鹿鸣》、《思齐皇姚》、《六麒麟》、《天之历数》等7曲。汉大乐食举有《重来》、《初首》、《侠安》、《归来》、《远期》、《有所思》等13曲。②

骑吹,随车驾行走时所奏的乐歌。乐曲有《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等。③ 横吹,军中马上所奏之乐。以箫、笳演奏,用于朝会道路的称为鼓吹;以鼓、角演奏,则称为横吹。鼓角横吹有《黄鹄吟》、《陇头吟》、《望行人》、《折杨柳》、《关山月》、《洛阳道》等15曲。胡角(加入西域音乐成分后称为胡角)有《出关》、《入关》、《出塞》、《入塞》、《赤之杨》等10曲,从西域还传入《摩诃兜勒》1曲。④ 短箫铙歌,军队凯旋时用于郊庙。乐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君马黄》等乐曲。

汉魏时期,文献已有关于独立器乐演奏形式的记载,称为“但曲”(即没有声乐配合的独立器乐曲),曲目有《广陵散》、《黄老弹》、《飞龙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鹄鸡游弦》、《流楚窈窕》,为琴、箏、笙、筑等乐器所演奏的乐曲。此时,古琴独奏艺术已获得高度发展,如嵇康演奏的《广陵散》等。

(三)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对中原音乐文化发展影响很大。据《隋书》、《旧唐书》音乐志所载,由于隋唐时期与西域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乐器数量骤增。特别是鼓类乐器,这可能是由于歌舞音乐的发展所致。打击乐器有铜钹、拍板、节鼓、杖鼓、腰鼓、羽葆鼓、柷鼓、桴鼓、齐鼓、担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等三十多种;弦乐器有独弦琴、阮琴、轧箏、凤首箏篥、五弦琵琶、奚琴等二十多种;吹管乐器有箫、义嘴笛、叉手笛、太平管、桃皮箏篥等二十多种。这一时期在乐器上的重要变化是出现了擦弦乐器轧箏和奚琴,开辟了乐器演奏的一个新的领域。

当时传入宫廷的西域音乐其乐队组合形式有7种之多。如:天竺乐,传自古印度的音乐,其乐工服饰中有僧衣袈裟,该乐应与佛教音乐有关;所用乐器有凤首箏篥、琵琶、五弦、笛、贝、铜鼓、毛

员鼓、都昙鼓、铜钹等9种(《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无五弦、笛,增有横笛、羯鼓)。龟兹(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乐,当时为唐朝宫廷中胡部诸乐之首;所用乐器有琵琶、五弦、竖箜篌、笙、笛、篳篥、箫、贝、毛员鼓、都昙鼓、羯鼓、答腊鼓、腰鼓、鸡娄鼓、铜钹等15种(《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无笛,用横笛)。西凉乐,初名为“秦汉乐”,在中原汉族音乐基础上,吸收“土龟兹”等西北民族音乐发展而成,西凉乐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宫廷的重视,对后世音乐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所用乐器有琵琶、五弦、竖箜篌、卧箜篌、弹箏、笙、横笛、笛、箫、大篳篥、竖篳篥、贝、腰鼓、齐鼓、担鼓、铜钹、钟、磬等18种(《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无大篳篥,另有掐箏、编钟)。高昌(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乐,唐太宗时才立乐部,《隋书·音乐志》将其附属于龟兹乐;《旧唐书·音乐志》所载乐器有琵琶、五弦、横笛、篳篥、箫、铜角、箜篌、羯鼓、答腊鼓、腰鼓、鸡娄鼓。康国(即今中亚撒马尔罕附近)乐,著名的“胡旋舞”即出自康国乐;所用乐器有笛、正鼓、和鼓、铜钹等4种(《旧唐书·音乐志》同)。安国(即今中亚布哈尔地)乐,所用乐器有琵琶、五弦、箜篌、横笛、双篳篥、箫、羯鼓、答腊鼓、腰鼓、鸡娄鼓、正鼓、和鼓、铜钹等13种(《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无箜篌、羯鼓、答腊鼓、腰鼓、鸡娄鼓、铜钹)。疏勒(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英吉沙二城一带)乐,所用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篳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10种。

除西域音乐外,隋、唐时期重要的音乐品种还有燕乐、法曲、鼓吹乐、琵琶音乐、古琴音乐等等。

燕乐是受清乐与胡乐(当时的少数民族音乐或外国音乐的泛称)二者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创作歌舞音乐,盛行于宫廷,为唐坐部伎六部之一。所用乐器有玉磬、大方响、掐箏、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大五弦琵琶、小五弦琵琶、大笙、小笙、大篳篥、小篳篥、大箫、小箫、正铜钹、和铜钹、长笛、短笛、揩鼓、连鼓、鞞鼓、桴鼓。其编制

与西凉乐接近,受西域影响较大,多种大、小乐器声部的配合应用,扩充了乐队的音域幅度,增强了乐队的表现能力。唐代张文收创作的燕乐曲有《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等。因燕乐以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故又称其为“琵琶乐”。

法曲起于隋,唐代亦盛行。它是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创作的歌舞大曲。隋初,法曲其音清而近雅,所用乐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秦汉子)。后“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使法曲在音乐上获得发展,唐时法曲又有《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等。《云韶乐》所用乐器有玉磬、琴、瑟、筑、箫、篪、龠、跋膝、笙、竽。

鼓吹乐,隋宫廷鼓吹乐分四部,各部乐队所用乐器不同。柷鼓部所用乐器有柷鼓、金钲、大鼓、小鼓、长鸣角、次鸣角、大角等7种,应用场合与汉代黄门鼓吹相近,曲目大鼓15曲、小鼓9曲、大角7曲。铙鼓部所用乐器有角、鼓、箫、笛4种,相当于汉代短箫铙歌,有乐曲12首。大横吹部所用乐器有角、节鼓、笛、箫、篳篥、笙、桃皮篳篥等7种,用于卤簿(即帝王的仪仗队),乐曲29首。小横吹部所用乐器有角、笛、箫、篳篥、笙、桃皮篳篥等6种,用于卤簿,乐曲12首。

唐宫廷鼓吹乐分五部。鼓吹部所用乐器同隋柷鼓部,不用大角;曲目柷鼓1曲,十叠,大鼓15曲,小鼓9曲,长鸣、中鸣各1曲三声。羽葆部所用乐器同隋铙鼓部,加用淳于,有18曲。铙吹部7曲。大横吹部、小横吹部所用乐器同隋大横吹部,有24曲。

隋、唐时期,琵琶音乐兴起,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在唐代宫廷与民间音乐实践中,从乐器制作与演奏技巧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并不断发展成为我国的一种重要民族乐器。这一历史时期,古琴艺术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涌现出诸如贺若弼、赵耶利、董庭兰、薛易简、陈康士等众多卓有贡献、影响深远的著名琴师,产生了许多传世的名曲和琴学论著。古琴记谱法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古

琴音乐的传播与发展。现存最早的一份古琴谱是文字谱,为唐代手写卷子,南朝梁丘明(493~590)传谱的《碣石调幽兰》。隋、唐时期由赵耶利、陈拙、曹柔等一大批琴家,对古琴文字谱进行改造并最后形成的减字谱式,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继文字谱以后古琴的专用谱式,一直沿袭应用至今。唐代的斲琴工艺登峰造极,空前绝后。四川雷氏家族世代制琴,盛名于世,其中尤以雷威最为著名,尚有作品传世,为国之珍宝。江南的沈镣、张越,亦为当时斲琴名手。

说唱音乐在唐代已经正式形成,以寺院里的变文讲唱为标志。

隋、唐时期的音乐艺术,以歌舞大曲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在歌舞大曲中,其大型曲式结构的各种类型,丰富多彩的乐队组合形式以及乐队中主要乐器在器乐化方面的迅猛发展,都达到了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其音乐与某些表演形式对东亚、东南亚音乐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宋、辽、金、元时期

宋代,其代表性的音乐品种可以说是词乐、古琴音乐与戏曲音乐。

词乐是配合词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词兴起于隋、唐的曲子词,中唐以后文人较多的参与歌词创作,在艺术性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五代趋于繁荣,宋代词的创作已进入极盛时期。词为长短句结构,是依曲调的长短曲折而增减词句字数的。故词牌均有定格,特点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词牌根据篇幅可分为令、近、慢等类别。张炎所著《词源》附有杨缵《作词五要》,曰:一要择腔,二要择律,三要填词按谱,四要随律押韵,五要立新意;所谈虽在作词,但重点却在词乐。词乐是我国古代的艺术歌曲,词乐除民间音乐外,也吸收了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民间乐人和文人也为这种音乐体裁形式创作新的曲谱,称作“自度

曲”。宋姜夔遗存的《白石道人歌曲》，所附的词乐旁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遗产。

除词乐外，两宋时期古琴音乐的发展，在中国音乐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南宋时期杰出的琴家、琴曲有郭沔的《潇湘水云》、《泛沧浪》、《秋鸿》；刘志芳的《忘机》、《吴江吟》；毛敏仲的《渔歌》、《樵歌》、《佩兰》等。

北宋时期，杂剧既是各种技艺（如滑稽戏、傀儡、皮影、说唱、歌舞、杂技、武术等）的泛称，同时又是专指一种戏剧表演形式。南宋时，“惟以杂剧为正色”，杂剧在各种技艺的表演中，已处于主要地位。宋杂剧已初步形成角色体制，并且将歌、舞、剧三者汇合起来，但在演出中仍然存在着不少技艺杂陈的非戏剧性的表演。金、元时期，杂剧已发展成熟。元杂剧所用的音乐称为北曲。元杂剧的剧本十分严谨，一本通常分四折（可加“楔子”）。元杂剧音乐的特点是每折用一个套曲；每套由若干同宫、同韵曲牌联缀而成（最少者3支，如《追韩信》，最多26支，如《魔合罗》）；每套套尾必须用煞尾、尾声；可在折首、折间或折尾，间插1~2支曲牌作“楔子”。《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载有北曲553支。著名的元杂剧作家与剧目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

南戏始于南宋初，因发祥地在浙江温州，故又名温州杂剧、永嘉杂剧，为区别于北方的元杂剧而称为南戏。南戏所用的音乐称为南曲。南戏全本分多段，每段称一出。南戏音乐的特点是每出无限用一个套曲，每套之间过场可使用一些集曲，但这些集曲不在套曲之内；每个套曲不限用一宫，可由两三个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每出可以有大量抒情性唱段；煞尾可有可无。南戏音乐中吸收北曲，组成了“南北合套”的音乐艺术形式，丰富了其音乐的表现力。《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载有南曲1442支（包括集曲），著名的南戏剧目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等。

这一时期擦弦类乐器有突出的变化和发展,继奚琴之后,宋代已出现了马尾胡琴。见于记载的还有胡琴、大阮、五弦阮、月琴、葫芦琴、渤海琴、火不思、三弦、冬布拉、基他尔、拉巴卜、提琴、哈尔扎克、洋琴等五十多种(实际上存在于民间的弦乐器其类别还远不止于此)。

宋代丝竹乐的演奏形式已有多种。如“细乐”乐队所用乐器有箫、管、笙、箏、轧箏、嵇琴、方响等。“清乐”乐队所用乐器有笛、笙、笙簧、方响、小提鼓、拍板、扎子等。宋代见于记载的还有“鼓笛曲”的演奏形式,鼓、笛是这一演奏形式中的两件主要乐器。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中还有“笛韵浑如丹凤叫,板声有若静鞭鸣”的生动描绘。宋代的“鼓笛曲”可能是唐代羯鼓演奏艺术的发展,亦可能是今天流传于苏南民间“十番鼓”的前身。宋以后,随着戏曲音乐的发展,笛子成为众多剧种的主要伴奏乐器,在民间亦有广泛的流传。

金、元时期的音乐,以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为其主要代表。戏曲音乐主要是杂剧与南戏,说唱音乐主要是诸宫调。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宋时用鼓、板、笛伴奏,元时加用了琵琶等弦乐器,故又称为“掐弹词”、“弹唱词”。诸宫调的曲调主要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初赚词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诸宫调的结构形式是由若干短套联缀而成的长篇,各短套是由不同宫调系统组成的。因此,诸宫调的体制宏大,曲调丰富,对后世戏曲与说唱音乐的发展颇有影响。诸宫调音乐各短套的曲式结构主要有四种:独立的单曲;同一曲牌双叠、多叠后加尾;换用多首同宫体系内不同调式的曲牌相接,后接尾声组成;缠令中加上缠达的曲式结构。金代董解元所作的《西厢记诸宫调》,作品中运用了14个宫调,151个基本曲调,加上部分曲牌的变体,共444首曲子组成,是现存宋、金时代诸宫调作品中保存了完整歌词和部分曲调的一部大型说唱音乐作品。

(五)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乐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戏曲音乐方面,在宋、元戏曲音乐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形成了以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为代表的四大声腔,当时声腔与剧种的名称是统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明代著名的四大剧种。从声腔的意义来看戏曲音乐,明、清以来的戏曲声腔体系可分为四类,即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这四种声腔开创了中国戏曲音乐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新兴发展起来的皮黄腔剧种京剧,其程式之严格,剧目之丰富,名家派系的发展之繁荣,艺术形式之完善,堪称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具有中国“国剧”之称誉。

说唱音乐在元、明词话的基础上,发展出北方大鼓、南方弹词,又有各地道情牌子曲、琴书、时调、小曲等,充斥于茶馆、书场、集市、庙会,以及田间地头,成为拥有最广大听众的一种民俗文化。

明、清以来,民间乐种由于其演奏与民间传承习俗的密切关系,各类不同的乐队组合形式与音乐品种,遍及我国南北各地。以其乐队组合形式来归类,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别: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锣鼓乐。著名的乐种有十二木卡姆、西安鼓乐、东北鼓吹乐、山东鼓吹乐、山西鼓吹乐、伊犁鼓吹乐、河北吹歌、晋北笙管乐、江南丝竹、十番鼓、十番锣鼓、福建南音、潮州弦诗、广东音乐、客家音乐、云南洞经、土家族打溜子、西安打呱社、天津法鼓、山西威风锣鼓、绛州锣鼓等等。

金、元时期从北方传入唢呐(又称金口角、苏尔奈),使鼓吹乐的演奏组合形式又一次产生重大的变革,从音色、音量和风格上进一步丰富了鼓吹乐的演奏。唢呐传入中原后,最初用于军乐。如明王磐所著《王西楼乐府》中之散曲《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

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据王圻所著《三才图会》的记载,明代唢呐已应用于民间。

在独奏音乐方面,明、清琴学的崛起和演奏上多腔走手的发展,使古琴艺术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境地。明、清时期,琵琶分南北两大派系在民间发展着。清中叶以后,在南方又形成了无锡、平湖、浦东、崇明等多种派别。筝更以其不同地域的旋律风格特点及师承关系自然地形成了各地方派别,如河南筝、山东筝、武陵筝、客家筝、闽南筝、潮州筝等。明、清以来,由于琴谱的刊印传播,理论上的总结探讨,演奏技法等方面的规范化要求,更促使了独奏音乐的进展。

明、清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琵琶谱得到刊刻流传,推动了古琴音乐、琵琶音乐民众化的流通与发展,见于记载的明、清时期的刊刻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清以来,著名的琴曲有《平沙落雁》、《渔樵问答》、《良宵引》、《水仙操》、《龙翔操》、《梧叶舞秋风》等。著名的琵琶曲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将军令》、《夕阳箫鼓》、《月儿高》、《平沙落雁》等。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国有着广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丰富的音乐品种。仅从目前所收集整理有关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舞蹈音乐、民族民间器乐来看(全部收集工作尚未完成),民间歌曲的歌种有千余种,精选曲目约两万余首;民间舞蹈音乐的品种有近一千五百种,精选舞曲约八千余首;曲艺音乐的曲种有三百余种,精选唱段有三千余首;戏曲音乐的剧种有二百余种,精选唱段六千余首;民族民间器乐除《琴曲集成》外(已出版近二十部),独奏音乐曲目近千首;民间乐种近百种,曲目已逾万余首。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